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0 年第 5 期

变化中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2020/09/15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专题序言 |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于关键十字路口。虽然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各国应承担起各自使命责任，开展建设性对话。世界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多元化的国际秩序。本期学科动态以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为主题，探讨了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及其原因；中国、美国和欧州同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系列成果 | 本期执笔：杨双梅、张倩雨、杨 易、黄宇韬、张尊月、潘晨熙、郭蔚霄。



Rebecca Adler-Nissen &
Ayşe Zarakol

"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erger of its Discontents"

近年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持久性日益引发人们的担忧。随着 COVID-19 大流行，国家间壁垒不断增多，自由秩序的捍卫者日趋减少。已有研究对此形成了不同解释：一是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引发了部分选民不满，但却不能解释为何民粹主义政策也得到高收入阶层的支持。二是将其归咎于半边缘地区国家公开蔑视国际秩序并干预相关自由主义国家的内政，但无法解释半边缘地区国家为何会拒绝曾经渴望加入的秩序，以及这种行为为何能够在西方赢得支持。

作者研究发现，当前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対实际上受到不断融合的双重力量影响：既遭受了来自西方核心地区的国内挑战，也面临半边缘地区的国际挑战。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也是一种关乎“承认”（recognition）的秩序，来自核心和半边缘地区的不满者对自身在国际秩序等级制中的地位感到沮丧。全文围绕五个部分展开论证：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对“承认”的理解与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双重承认斗争。第二部分探究了西方民粹主义群体不满当前秩序的原因。第三部分讨论了半边缘地区成员国不满的历史根基。第四部分则解释了上述双重斗争日趋融合的原因。第五部分是对当前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诸多不满的根源在于不满者的地位诉求未能得到承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强调平等，但却以某些西方群体的损失为代价（这些群体曾享有地位特权），同时也被半边缘地区解读为虚伪（该秩序并未取得真正进步）。对上述两类群体而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创建替代秩序的障碍，因而面临来自

核心和半边缘地区的双重冲击。西方核心地区民粹主义政党对国际秩序的不满既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与担忧其丧失地位优势有关，包括对历史地位的怀旧情绪。因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应对机制，能够将对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社会认同，以反国际主义形式呈现，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表示愤怒。对半边缘地区国家而言，由于 19 世纪形成的西方与非西方的特殊关系，半边缘地区国家面临来自西方的污名化问题，因此希望通过加入西方自由秩序来进行污名管理，以便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然而，当无法获得国际秩序对其地位的承认时，怨恨与不满便会滋生。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增强了边缘地区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却也为它们提供了从内部冲击国际秩序的机会。

那么，上述两种不满情绪是如何融合并冲击自由秩序的呢？一是数字技术加速了思想和行动的全球传播，也为秩序不满者提供了形成认同的平台。二是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为不同阵营的合作扫清障碍。三是自由秩序的内部脆弱性——秩序的挑战者却也是受益者，如许多对自由秩序表示不满的政权也得到了自由主义精英的支持。此外，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等偶然性因素也加速了这种融合。俄罗斯作为受挫的历史大国，既在国际体系中享有优越感，又因地位丧失而心怀不满，同时能够扮演西方和非西方两个角色，这种特殊性使得俄罗斯既要对抗自由秩序，又希望将西方从自由秩序中拯救出来，同时将其他国家从西方解救出来。这引发了来自核心和半边缘地区群体的共鸣。

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必须了解新兴的跨国意识形态和网络（通常由数字技术推动），以便正确评估当前自由秩序的不适。就数据和方法而言，除了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之外，还应研究普通公民的社交媒体互动。自由秩序不仅是一系列



规则和制度, 还是一种承认秩序, 无论绝对收益如何, 这种秩序都必然引起不满。
国际关系研究应当重视“为承认而斗争”作为驱动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编译: 杨双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onald Rogowski

"Rising Inequality as a Threat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2019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A)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过去几十年内有效地推进了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跨国流动，显著降低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使现代世界从“大分流”走向了“大合流”。然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副作用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贫富差距已成为影响国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许多欧洲区域层面的证据已经显示，经济不平等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不断升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

按照传统解释，发达经济体通常人力资源充裕而低技能劳工稀缺，因此在持续扩大的对外贸易中，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将受益，而受教育程度低的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将受损。数据也大致支持这一论断：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拥有大学学历的工人收入仅比那些同种族和同年龄、但只拥有高中学历的工人多四分之一左右；然而到2010年，这一差距已上升至近50%。由此可以合理推定，拥有高学历的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更倾向于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然而，发达经济体出现的最新变化表明，并非所有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都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反，技能溢价（skills premia）急剧上升，使社会出现了“头重脚轻”（top-heavy）的倒金字塔型财富结构——绝大多数财富流向了最富有的1%，甚至是0.1%。如果更仔细地观察会发现，发达经济体最富有的10%所占财富份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最富有的1%所占份额的增长，而处于第九十至第九十九百分位之间的人所占财富份额只有相对微不足道的增加。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的巨大收益流向了如此小的精英阶层，而其他阶层的收入增长相对较少，这一事实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民粹主义不仅将矛头指向了自由贸易和移民，而且越来越多地发出对一小撮“邪恶”精英的反对声音，并且民粹主义不光吸引了低技能劳工，还越来越多地获得了高学历选民的不可忽视的支持（在传统模型中，这一群体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轰轰烈烈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不平等严重阻碍了国内经济增长，并且加剧了政治领域的两极分化。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国内精英很可能追求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民族主义”（*diversionary nationalism*）——通过塑造紧迫的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追求再分配政策的注意力。结果是增加了国家间发生经贸摩擦的风险，甚至可能带来国家间敌对状态或实际武装冲突。

尽管学者们已就日益加剧的国内不平等状况提出了一系列合理且能促进增长的补救措施，如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和国内实施再分配政策，但目前来看，没有一个能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似乎在未来也不太可能得到）。迄今为止，各种调查实验也没有表明，政治支持乏力仅仅是由于民众的“无知”所致——即使在得知不平等的真实程度以及未来可能持续恶化的发展趋势后，普通选民也不会增加对再分配政策或累进税制的支持。因此，我们最可能的未来是悲观的：不平等将继续扩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依然受到排斥和侵蚀，以及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持续放缓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国际冲突。

编译：张倩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Maria J. Debre & Hylke Dijkstra

"Covid-19 and policy responses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or window of opportunity?"
(NestIOr Working Paper)

疫情当前，随着许多国家以牺牲多边合作为代价推行本国优先的战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进一步扩大，国际组织更是首当其冲。然而，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国际组织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有的国际组织陷入僵局，有的则得以延续运行，甚至将危机转化为其拓宽政策范围、发展政策工具的机遇。本文通过横断面分析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欧盟（EU）和欧洲理事会（CoE）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影响国际组织政策适应性的主要因素与这一因素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启示。

作者基于制度理论，对关于影响国际组织政策适应性的因素提出了两套假说并分别进行了验证：一是授权程度的影响，即权力的下放与集中；二是官僚能力的影响，其中考察方面包括职员、预算和官员领导力。同时，控制以下几种变量：

（1）中美是否同为该国际组织的成员；（2）成员国数量；（3）成员的偏好异质性；（4）新冠病毒案例数量的区域差异；（5）政策领域差异。由于不同国际组织对疫情的最初反应很可能决定它们未来的政策方向与发展道路，因此研究使用了75个主要国际组织在疫情初期政策反应的原始数据，其中，22个国际组织未对疫情做出反应，35个国际组织维持正常运行，18个国际组织对疫情表现出高度适应性。

研究共发现三点。其一，官僚能力，特别是职员的规模和水平，是影响政策适应性的最重要因素。人数充足的秘书处确保国际组织能够委派职员以新的工作



任务，灵活应对危机；大型官僚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拥有足量的知识储备，维护系统有序运行。与职员相比，预算与官员领导力对政策适应性的影响并不明显。

其二，议程设置权的下放也是影响政策适应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除议程设置权之外，授权程度与政策适应性无显著相关。虽然正式授权决定了政策反应的对象和流程，但当危机发生时，非正式治理往往更占上风。

其三，上述五种变量对政策适应性没有影响。疫情的迅速展开使许多在疫情范围内的国际组织立即发布了应对政策，但拉丁美洲、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区域组织，以及一些拥有全球成员的国际组织也采取了预防措施，未雨绸缪，为病例的增加做好了准备。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区域差异并不明显。此外，中美两国是否同为成员国也并非影响因素，这是由于多数全体会议和执行机构未曾连续举行会议，使中美矛盾不会成为政策推行的阻碍（安理会除外）。这也说明，国际组织的许多日常政策制定实际发生在大国政治领域之外。

最后，文章通过案例分析，说明了秘书处规模在实际运作中的重要作用。面对疫情，WHO 官僚机构除履行相应职责外，还启动了一些新项目与供资渠道，面对中美分歧升级迅速开展行动，积极应对危机；EU 在前期侧重于使用现有政策工具，随后成员国进行了联合应对，将其治理范围扩大到卫生领域，并发行了欧洲债券；CoE 开发银行发放了高额债券为卫生部门提供资金，并向需要资金的成员国开放贷款，资助疫情相关支出。

本研究为评估当前自由国际秩序的现状提供了例证。尽管仍需等待疫情的长期影响，但事实表明，许多国际组织仍然是多边主义的堡垒，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前景也未必灰暗。此外，本研究还为全球治理的体制设计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一直认为非正式治理是更加灵活的治理形式，但本研究



发现，设有大型官僚机构，更加传统、正式的国际组织，政策适应性更高。危机到来之时，官僚机构在缺乏正式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推动议程。这对未来全球治理的体制设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编译：杨 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0, 21(2): 109-153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academic.oup.com/isp

Carla Norrlof, et al.

"Global Monetary Order and
the Liberal Order Debate"

美元作为国际上被广泛运用的储蓄、交易和定价货币，是支撑世界经济的中心。关于美元是否能够维持其国际地位，以及美国是否能维护其所主导的自由主义金融秩序，在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支撑美元国际货币的因素有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份额、美国在世界广泛的驻军，以及以美国为中心所建立的各种国际制度。但近年来，这些支撑因素受到了动摇：由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经济占世界 GDP 与贸易的份额都已经下降、美国的巨额债务揭示了其经济的内生问题、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与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着自由主义秩序等。但是，研究全球货币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国所主导的金融霸权有其自我强化的惯性，并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因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无法改变美国金融霸权的现状。

这篇文集结合了 5 篇简短讨论，以对“美元霸权衰落论”的立场进行反驳，并详细论证了全球货币秩序与自由主义秩序的关系。第一篇文章讨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特权，如不受国际金融“不可能三角”的约束、政府债务对货币价值的影响微弱，以及巨额的铸币税。全球货币秩序一旦形成就有其惯性，试图代替美元的货币不仅要满足成为世界储蓄货币的基本条件（如欧元），同时必须证明其有着更大的优势，否则就难以完成替代。第二篇文章认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的国际贸易交易货币，放大了美国的世界影响力，比如把个别国家剔除美元支付体系以对该国进行制裁。第三篇文章认为得益于美国的世界驻军，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广泛地扩展其国际化业务，同时也让使用美元的安全性得到保



障。第四篇文章从美国与沙特的特殊关系，解释了为何国际原油交易以美元定价。最后一篇文章强调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货币秩序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秩序并不完全重合，并简短分析了中国可能对美国全球货币秩序造成的冲击。从资本管制、货币国际化、评级机构去美国化，以及区域危机金融贷款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所做出的尝试和所面临的局限。

论文集最后提出了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美元霸权的持续存在是否是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前提？美国建立的自由主义秩序是否是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前提？如果美元霸权消失，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还能继续维持吗？如果自由主义秩序被破坏，美元霸权是否还能被维护？作者认为，美元霸权既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产物，同时也是维护自由主义秩序的重要力量。回答以上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全球货币秩序与自由主义秩序的辩证关系，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指出了方向。

编译：黄宇韬（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在针对中国崛起的大量研究中，经济和军事权力，以及软实力都被广为关注，而制度性权力则被显著低估和忽视。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持续发展使部分学者忧虑中国是否会冲击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已有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相互竞争的传统理论。根据结构现实主义和长周期理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短期内会“去合法化”（delegitimize）当前的国际秩序，长期则将试图取代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自由建构主义（liberal-constructivist）者则认为鉴于自由主义制度的韧性，其易于加入但很难被推翻。中国已经融入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将继续维持自由秩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种可能对此予以解释的是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视具体情况而变化。

无论是认为中国反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理论还是认为中国适应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理论，其都认为国家行为模式具有一致性。路径依赖理论则认为国家的行为是零散的，不具有一致性。与现实制度主义“能力分布的变化”和建构主义“社会化效应”不同，“制度情境”是该理论观点的关键变量。制度情境因问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对于向国际制度迈进的崛起国来说，几乎没有一套普遍的、占优势的 and 一致的政策选择。此时国家行为体的最优策略是“战略框定”（strategic framing），中国对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态度是因议题而变化的。战略框定并非是崛起国的专属，任何国家都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这种策略。

在对不同理论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作者选取了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四个组成部分，来对当前解释中国行为模式的三个竞争性理论进行检验。四个

部分分别为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模式、世界贸易组织的治理、对南海常设仲裁法院决定遵守与否，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权力动态变化。这四个部分代表了不同领域的议题：集体决策、贸易问题、领土争端以及金融部门，而这些领域也一直被视为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竞争的关键点。

中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方式表明，只要其合法性在主要利益相关者国家的实践中得到牢固确立和内在化，它就不会试图推翻或冲击现有机构。在世贸组织的体制背景下，中国通过援引世贸组织的规则和程序积极应对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这种“积极的法律主义”远非对秩序的冲击。中国不愿接受南海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驳斥了建构主义者的社会化主张。鉴于其他多数大国长期未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声称中国推翻或冲击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显然也是无力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建立亚投行计划同时出现，加深了对中国重塑全球金融秩序的质疑。但亚投行地缘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有限，其有限的资本认购使其取代现有机构的可能性很小。大量证据表明，亚投行不是中国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手段。

作者通过对中国在以上四个全球治理核心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比较案例分析，有效评估了中国在不同领域问题中行为模式的差异，阐明了中国对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主要组成部分的行为模式是高度问题驱动和路径依赖的，受到制度情境的强烈影响。作者同时指出，因其缩小了使中国成为发展中的国际秩序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政策空间，现实主义试图将中国定为现有国际秩序冲击者的观点弊大于利。

编译：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

当今世界对自由主义秩序的观念争议不断，欧洲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一员存在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近年来威权主义兴起和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让自由主义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首先解释了自由主义秩序的含义以及“秩序”和“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指出自由主义秩序带来的主要益处在于和平、繁荣和政治包容。然后作者从外部挑战、内部不满和义务承担这三方面详细分析了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最后作者认为当前欧洲面临着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欧洲有责任和能力采取更加实用和有效的措施，维护自身核心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秩序。

作者首先解释了自由主义秩序的含义以及“秩序”和“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指出“秩序”是基于国际法用来管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一系列法规，它的目的是消除暴力和提供稳定。“自由主义”即基于民主、人权、法律、市场经济和公平贸易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自由主义秩序带来的主要益处在于提供和平环境、促进经济繁荣和达成政治包容。

其次，作者从外部挑战、内部不满和义务承担这三方面分析了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的挑战。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破裂，自由主义秩序迎来黄金时代。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和中国的崛起对自由主义秩序带来了外部挑战，主要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市场化。美国同欧盟一道共同维护自由秩序，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一转先前势态，高呼美国至上，严重破坏和动摇了西方自由秩序的根基。自由主义秩序和经济一体化虽带来了许多益处，但同时也引发了内部



不满。全球化一方面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另一方面也损害了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利益，并使得精英阶层成为既得利益者。这造成了西方世界内部贫富差距扩大、移民、国家主权、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抬头。与此同时，美国一直被认为对其盟友的国防开支与发展援助过大，但近四年来欧洲国防开支稳定增长，自上世纪 70 年代欧盟援助已赶超美国。纵观美国援助历史，从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经合组织，美国的援助对二战后重建自由主义秩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美国近年来对发展援助的减少也直接影响对自由秩序维护。

最后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秩序已经成为欧盟全球战略里的重要一环，欧洲各国也同时把自由秩序作为衡量国家利益的标准。欧盟也试图从国防安全、制度、经济等方面维护自由秩序在欧洲的发展。随着新型冲突形式的出现，改革势在必行。欧盟需要带动联合国和北约进行改革来避免冲突和维护和平。同时欧洲也需要联合价值观相同的盟友一同促进经济自由和政治进步，如联合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盟友一同加入和维护自由主义秩序。欧洲对自由秩序的坚守并没有固定模式，维护自由主义秩序需要采取更加实用和有效的方法。因此执行者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决定“自由主义优先”还是“秩序优先”。

尽管当今世界自由主义秩序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对欧洲来说同时也是一个战略机遇。欧洲仍然有能力维护自由秩序的核心目标：和平，繁荣和政治包容。

编译：潘晨熙（圣安德鲁斯大学、威廉玛丽学院）

随着近二十年中国在各个领域的迅速崛起，东亚乃至世界格局都在发生结构性演变。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产生了更多的竞争性互动与激烈冲突。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不断指责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后者在经贸、军事安全、国际组织、国际规范、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破坏了国际秩序与规则。然而从国家政策和行为来看，中国不断强调其立足于维护国际秩序，并积极承担国际治理责任。自居维护现状国的美国却频频违反国际秩序，成为破坏性力量。美国是否以维护秩序之名，行修正主义之实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鉴于将国家是否改变特定权力分配，或是对国际组织的参与支持程度作为标准衡量国家修正主义与是否存在模糊性的缺陷，本文选择聚焦于国际秩序，将国家行为与国际规则直接挂钩，美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规则成为作者判断其是否为修正主义国家的重要标准。但是“客观”的国际规则实际上并不存在，且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导致了规则的模糊性。因此，作者通过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硬规则”与“软规则”，使得国际秩序概念更好地进行操作化，以便于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与行为进行衡量评估。

文章随后对两种规则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考察特朗普政府上台至今的行为态度是否与之相悖，并与近十年美国的相似行为进行对比，以判断美国行为的变化趋势。“硬规则”指普遍被接受、争议较少的国际规则，包括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规则、军事力量分布和军事行为规则以及国际贸易规则。针对这些规则，美国采取违反与破坏的手段：漠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干涉拉美、中国、中东的内

政；扰乱军控与武力使用规则，退出伊核协议，随意在中东地区使用武力；挑起单边主义贸易冲突，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频繁单边制裁，扩大关税措施使用范围。“软规则”指存在争议较多、共识程度低、评价标准模糊的国际规则，包括人权保护规则。环境保护规则和信息情报规则。美国对此采取霸权主义和双重标准的态度：人权规则上言行不一，发布禁穆令等移民禁令，在叙利亚地区的军事行动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环境保护上倒行逆施，随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信息情报上充满霸权主义，大肆监听监控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设置外国投资壁垒限制重要技术数据出口，利用“长臂管辖”权扩大执法机关调取海外数据的权力。与近十年美国政府的相似行为对比，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所采取的违规措施明显增多，严重侵害了国际规则。

作者最后进行了总结与展望，明确指出美国并没有遵守国际规则，反而存在着全面修改当前国际秩序的倾向。虽然这种现象与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密切相关，但美国作为霸权国为何在短时间内频繁违反国际规则，这种情况会造成怎样的后果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编辑：郭蔚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声明：对观点的摘录和引用不代表编者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对观点的认同。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琳 熊爱宗 鲁桐 吴国鼎
陈兆源 韩永辉 宋锦 刘玮
沈陈 田旭 彭博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孙振民 张尊月 郭蔚霄